

目 录

回忆进军西南及到铜梁后接管旧政权建设新政权工作的概况.....	董照莱	(1)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西南服务团简介.....	吴家骧整理	(18)
铜梁地下党为“迎接解放配合接管”做的工作.....	周秀林整理	(23)
解放初期在铜梁工作的二野军大学员.....	吴家骧	(34)
解放初期的铜梁县征粮宣传队.....	杨荫德	(42)
铜梁剿匪中的情报工作.....	袁安祚稿 文史办整理	(46)
铜梁剿匪期间参加使察工作的回忆.....	罗霞村	(50)
解放初期参加铜梁一区剿匪的回忆.....	杨德律	(59)
解放初期旧县区剿匪记略.....	周祖炎	(67)
解放初期大庙地区的土匪暴乱及剿匪经过.....	蒋厚道	(78)
回忆解放初期铜梁板桥区剿匪概况.....	张祖宜 张兴良	(85)
活捉匪首张述江.....	许守田	(96)
我县民国时期的田赋与解放后的农业税.....	叶建中稿 文史办整理	(98)

回忆进军西南及到铜梁后接管旧政权建设新政权工作的概况

董 照 莱

铜梁县是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二日解放的。

从铜梁解放、接管、建政到现在，已过去四十年了。

四十年来，铜梁和全国一样，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民政权更加巩固了，工、农业生产、文化教育、商业、供销、交通、运输及城镇、农村等建设事业蓬勃发展，人民生活大大改善，现正朝着小康水平奋进。当年来铜梁负责接管、建政并常期留在铜梁工作的西南服务团的同志、军大的同志和铜梁地下党的同志，在这四十年的岁月里，夙兴夜寐，饱经风霜，青丝已变成白发，而绝大部分都已离休了。胜利的今天，回首往事仍历历在目。现根据自己的亲见、亲闻和亲身经历，简要地将进军大西南，到铜梁与地下党会师，接管旧政权、建设新政权的概况回忆整理如下：

一、进军大西南

一九四九年四月，百万雄师横渡长江，京沪杭战役取得胜利后，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司令部，根据党中央及中央军委发出的“将革命进行到底，向全国进军”和“应准备两个月后，向西南进军”的部署，于六、七月份在南京、

上海两地，从二野部队、老区和各支前组织中抽调了大批干部，从第二野战军军政大学里抽调了几千名学员，又从京沪杭各有关学校和社会上招收了一批专家学者和知识青年组成了西南服务团，作为解放和接管西南地区的一支随军干部队伍。我们到铜梁的西南服务团的同志属第一团第一支队。整个服务团于一九四九年的六、七月份在南京集中，经过了两个月的系统学习，统一了思想认识，意志坚定、任务明确，为进军西南做好了一切准备。

一九四九年九月底，服务团的第一批同志，怀着火热的心，牢记着上级的指示，肩负着党的委托，从南京出发了。先步行到下关，然后渡江登上火车向武汉进发。尽管我们乘坐的是二、三等车皮（即闷罐车和只有框框的货车皮），但同志们精神振奋，歌声嘹亮，没有怨言。更使人振奋的是离开南京不久，广播里传来了特大喜讯，我们的领袖毛主席在北京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地向全世界宣布：“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这时我们热血沸腾，群情激奋，盼望着早日随军进川去彻底埋葬蒋家王朝。

我们的进军路线是：从南京出发乘火车经徐州、郑州到武汉，在武汉稍事休整后，又经岳阳，横渡洞庭湖，到湖南省常德市的王家大屋。经过学习整编后，即随着二野三兵团的大部队一路经秀山、酉阳、彭水、武隆过白马山，到南川经綦江到重庆。铜梁中队的绝大部分同志都是走的此路。

西南服务团的同志，在向大西南进军过程中，虽未直接参加战斗，但行军的生活却是异常艰苦的。至今使我们难忘的是：那闷罐火车的拥挤和闷热，过八百里洞庭湖时的狂风

巨浪，在进入山区时走过的泥泞小路，攀援的绝壁悬崖，还有那陡滑的酉、秀高山，汹涌的乌江巨浪，白马山上的冰天雪地，急行军时的戴月披星，更困难的是，刚跨入山区偏境，又遇到多雨季节，个个是外浸雨水内出汗，一身衣服打湿了又沤干，干了又打湿。在行军过程中除少数病号和领导外，人人都身背米粮行装，负重几十斤，行程几千里，基本上是靠一双脚一步一步走过来的。而且在行军过程中还不时有土匪及国民党散兵游勇的偷袭。在这种艰苦条件下，同志们靠的是坚强的革命意志，党和人民的重托，前方胜利的鼓舞，激励着我们完成行军任务的。从九月底离开南京起，到十二月十三日到达重庆止，两个半月时间，除在常德市的王家大屋驻下整编外，其余近两个月的时间全是在行军途中度过的。进军大西南，且不说炮火连天、硝烟弥漫的战斗生活，就是那数千里的艰苦行程，也是一场伟大的壮举。

一九四九年十月中旬，我们到达王家大屋时，上级对即将入川的西南服务团干部作了组织调整，将干部按接管的地区配备定位。璧山大队的负责人是张庆林、熊宇忠。张为璧山地委书记，熊为副书记，韩明为专员。下设十个中队，即江津、合川、巴县、江北、铜梁、綦江、永川、大足、荣昌、璧山十县。每个中队为一个县的班子，负责接管一个县的工作。铜梁当时共配了干部五十余人，县委书记赵启光（现名李崇仁，下同），县长王其龙，宣传部长刘平。同时配备了各区分委和区政府的负责人。又对干部进行了形势、任务和新区接管政策的教育。川东地下党负责人肖泽宽、邓照明等同志介绍了重庆和川东的政治、经济等情况；常德市委介绍了他们接管新区的工作经验；张霖之同志作了关于接管

城市的报告；张庆林同志还作了新区工作方针和任务的报告。通过这次整编和学习，保证了后来的整个接管工作的顺利进行。

二、胜利的会师

早在解放大军接近重庆市附近的时候，铜梁地下党就做好了迎接解放的准备。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三十日重庆解放，当晚铜梁县的国民党政府县长林宏仁、特委会秘书曾平、自卫总队的副总队长等，带领自卫总队中的两个中队（自卫总队的另一部分人，经过地下党的工作留在铜梁）和县府的部分科、秘、警卫人员深夜潜逃了。十二月一日上午，地下党铜梁中心县委书记游文俊，指派地下党铜梁县委书记魏新文、委员黄定文出面，约见当时铜梁的知名人士顾鹤皋，会同铜梁的前任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刘代芹、书记长周家泽、参议长汤锡光、商会理事长魏洪模、巴川镇镇长阮溢中（即阮肇成中共地下党员）等十多人，组成了迎接解放的地方组织——铜梁县机关法团联合办事处。由汤锡光任主任、魏洪模、阮溢中任副主任、田乐（中共地下党员）任秘书。十二月二日铜梁县机关法团联合办事处正式办公，代行县政府职能，发了公告，知照铜梁各乡、镇，并负责组织群众欢迎解放军入城，供应过境解放军所需要的粮草，维持社会治安等工作。后来根据解放军三十四师领导的指示，将“机关法团联合办事处”改名为“铜梁县临时人民办事处”，增加了各阶层人士十多人为委员。这个组织承担了从铜梁解放到铜梁县人民政府正式成立这段时间的行政职能工作，对维护当时的社会安定和各项组织工作起了一定的作用。

解放后，负责铜梁县接管、建政工作的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服务团壁山大队铜梁中队。铜梁中队共五十余人，先后分两批到达，第一批三十多人，由赵启光、王其龙同志率领，于十二月十三日赶到重庆。当各县的领导人在川东区党委开会，具体安排到各县的工作时，与中共铜梁地下党负责人游文俊同志接了头，十六日随游文俊乘车赶到铜梁。十七日在巴川镇原县银行（现县百货公司处）与地下党同志会师。当天参加会师的西南服务团同志有赵启光、王其龙、刘平、黄兴才、杨世怀、张纪三、蹇令政、刘希奎、刘玉秀、南庆祥、刘富清、杜庆和、李传厚、韩其弟、李炎煜、周兴旺、张兴良、张道成、董照莱、曹久显、孙宝泉、张芳振、薛清海、吕星五、王传熙、李春平、施景鲁、徐雁秋、刘立本、于洪娥、于江、余国英及通讯员马成芳、李金经等。地下党参加会师的有游文俊、张永明、康兴浩、周继开、徐有信、曾昭元、魏新文、李湘石、梁治平、胡浩、刘绍向、唐伊任、阮肇成、黄定文、赵时圣、陈富治、汤仲威、韦中伯、刘如云、陈在伟、何翰群、张湛泉、余英、罗启蒙、杨德闾等。两股革命力量相会，犹如渴望已久的亲人相逢，紧紧地握手，亲切地问候，个个喜泪盈眶，人人心花怒放，共感如鱼得水，如虎生翼，一些青年同志又是唱，又是跳，欢乐之情难以言表。

会师会上，先由赵启光同志传达了有关接管的任务和政策；游文俊同志介绍了铜梁情况；宣布了中共铜梁县委员会的成立。书记赵启光、副书记游文俊（地下党员）、委员王其龙（任县长）、刘平（任宣传部长）、候补委员张永明（地下党员、任组织部副部长）。同时安排了各区的负责人，

地下党的同志作了相应的分工，布置了即将展开的接管工作。

三、接管旧政权

十二月十八日召开了铜梁县各界民主人士会议，肯定了他们为迎接解放所做的贡献，向他们宣传了党在新区的各项政策，号召他们继续工作，共同维护好社会秩序，等待接管。二十日，铜梁县人民政府宣告成立，发布了第一号布告：

“奉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政治部电令，任命王其龙为铜梁县县长。”通告全县人民。二十五日，铜梁县人民政府在南较场召开群众大会，庆祝铜梁解放和县人民政府成立。在这期间，服务团的第二批同志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军政大学（以下简称军大）的同志也先后来到铜梁。于是以服务团的同志、铜梁地下党的同志、二野军大的同志共同参加的接管旧政权、建设新政权的工作，便迅速展开了。

十二月二十五日县委召开会议，对接管工作做了全面布置，具体落实了接管班子，先组建了四个科进行接管，即秘书科、财粮科、文教科、公安司法科。张纪三为秘书科长，董照莱等在秘书科工作，具体安排董照莱接管民政科；周继开（地下党员）接管财政科，黄定文（地下党员）接管教育、建设科；阮肇成（地下党员）接管警察局、地方法院，服务团的曹久显、孙宝泉到科工作；丁胜昌接管自卫总队；陈富治（地下党员）接管邮电局；刘春涛（地下党员）接管税捐处；蹇令政接管田赋管理处；汤仲威（地下党员）接管县银行；余英（地下党员）接管县仓库；杨松亭接管卫生院。其他部门先由秘书科接管，然后陆续安排人去负责。

当时接管的总政策是：“对各种旧人员、旧武装原封不动地包下来，令其在人民政府领导下照常供职，听候接管”。

接管的具体步骤是：按各负责同志分工接管的单位，分别召开旧人员会议，宣布接管，开展工作。随即进行调查了解工作，对旧人员，经过初步审查后，分别作出处理。即对历史清楚，又熟悉本单位工作的人员，留下继续工作，每个科当时都留了几人；对一般可以教育的人员介绍了一批到“西南革大”去学习；对少数老弱病残等人员则动员回家生产。

对县属各机关单位的接管工作，前后花了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共接管了大小单位三十多个（不包括学校），旧职员、雇员、旧武装人员（包括乡一级旧武装）一千多人。另外还接收了七百多条枪支，一万四千八百多块银元及一部分伪银元券。

在此同时，对全县划分的六个区，分别配备了党、政负责同志。第一区区分委副书记刘希奎、区长南庆祥、副区长刘玉秀（兼巴川镇镇长），许守田、刘立本、杨德闳到区工作，区政府设在南郭；二区区分委副书记刘富清、区长李湘石（地下党员）、副区长杜庆和、民运委员陈正亭、财粮助理员蔺锦玉，区政府设在旧县；三区区分委副书记杨世怀（主持日常工作）、副书记张道成、区长梁治平（地下党员）、财粮助理员薛清海，区政府设在安居；四区区分委副书记李传厚（主持日常工作）、副书记胡浩（地下党员）、区长韩其弟、财粮助理员张芳振，区政府设在平滩；五区区分委副书记李炎搞、区长刘绍向（地下党员）、副区长周兴旺、财粮纪孝民，于洪娥（女）到区工作，区政府设在虎峰；六区

区分委副书记黄兴才兼任区长、副区长张兴良、财粮助理员左文学，余国英（女）到区工作，区政府设在板桥。

各区分委、区人民政府成立后，对全县的三十七个乡、七个镇和六百三十一个保，进行了接管。接管后一律沿用旧制，对伪乡、保人员，绝大部分令其照常供职。对原乡、镇人员已逃跑的，重新委派了人去负责。解放初期原乡、镇人员逃跑而由地下党发动民主人士接管的和人民办事处任命的乡、镇长，县政府予以承认，并支持其工作。对各乡、保武装人员，有的区、乡采取由地下党员插进去掌握的办法，有的区、乡则择优录用，改编为县、区武装力量。对党政军头目（民主人士除外）则转送到川东地区公安处集训。

在接管的基础上，逐步建立了必要的科室，服务团的同志、军大的同志、地下党的同志都分别分配到各科室工作。从此使全县各项工作正常地开展起来。

四、建设新政权

对旧政权的接管只是民主建政的开始，整个民主建政工作，则是经过征粮、剿匪、清匪、反霸、减租、退押、土地改革这样一个较长的时期逐步完成的。人民政权和封建政权有着根本不同的性质，他是代表人民利益、保护人民利益的政权，是建立在人民群众爱戴和自觉拥护的基础上，扎根在群众心坎里的政权。是经过逐步培养扩大革命干部队伍，深入发动群众，依靠干部群众，彻底从政治上、经济上打垮封建势力，按照人民民主制度，逐级选举产生的村、乡政权。是把经过考验的，德才兼备的骨干安排在各级政权中，把基层的领导权（印把子）、武装力量（刀把子），掌握在已经

觉悟了的雇贫农手中，这样一个崭新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

为了建设好县以下各级民主政权，从接管旧政权开始到各级民主政权建设结束，认真解决了以下几件事：

第一、大力培养和逐步扩大干部队伍。

“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因素”。解放初期我县的干部来源大体分以下七个方面：

一是进军大西南的服务团干部。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中旬到铜梁的服务团干部计五十多人，一九五〇年十月后陆续调走了一些，又陆续调来一些，如田立杰、李焕章、张国芬、杨荣忠等就是后来从外县调来的。一九四九年底，除各区的区分委书记、区长、财粮助理员及县里已安排的外，还有徐于成、王传熙、吕星五、姜长盛、马延超、曹俊侠、姚永福、于江、徐雁秋、李春平、李殿生、王述琼（女）、朱秀云（女）、支青兰（女）、陈云（女）、芮玉梅（女）、杨海全、韩玉端、李金经、马成芳等，都充实到各部、委、科室工作。

二是铜梁的地下党员。除解放初期配备了一些县、区及县里各科室干部外，各区的组、宣干部、青年、武装、民政、文教及各乡的乡指导员，绝大部分都是从经过培训和斗争考验的地下党员中选拔出来的。这部分同志是解放初期的骨干力量之一。

铜梁地下党员有四百多人。解放初期根据上级指示，党组织还没有公开，但绝大多数地下党员，都以各种不同身份参加了征粮、剿匪工作，在斗争中大多数同志立场坚定，机智勇敢，斗争坚决，还有好几位同志在剿匪斗争中献出了自

己的生命。如王立宇、彭万兴、何代宇、肖梦石、卓利彬、杨守质、李亚军等同志，他们都是永远值得怀念的同志。

三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军政大学的同志（以下简称军大）。军大同志前后分两批到达铜梁，第一批是一九四九年的十二月二十五日来的共十余人，来后即投入接管旧政权及培训地方第一批干部队伍“青训班”的工作中去。第二批是一九五〇年一月初，和三十四师随营校的同志一起到铜梁来协助征粮的。随营校来时是一个连的编制，其中军大同志占一个排共三十余人。在这同时又来了一批新军大的同志（重庆解放后在各地招收的新学员，当时仍称二野军大后改为西南军大）。上述同志到铜梁后即投入征粮工作。土匪暴乱后，又全力投入剿匪工作。在征粮剿匪工作中仅军大同志就牺牲了十人，随营校的也牺牲了二人。剿匪结束，随营校回重庆时，应县的要求留下了军大同志十四人，随营校同志四人（西南军大同志在剿匪中期已全部返回了重庆）。来铜的军大同志也是解放初期的骨干力量，他们先后被安排在公安司法、县、区武装部门、团县委、县农会及税务、粮食、文教等部门工作。

四是解放初期举办的青年干部训练班（简称青训班）。根据上级指示于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以后至一九五〇年一月六日之间，在铜梁县开始筹办“青训班”，招收本县思想进步的知识青年来培养革命干部。由县长王其龙任校长，宣传部长刘平任副校长，服务团的王述琼（女）任指导员，吕星五任组织教育科长，黄定文（地下党员）任行政科长，军大的徐恕德、周树德、沈宏达、陈含辛、戴迺煌、陈永固六同志分任六个区队的区队长。在配了干部和工作人员

后立即招生考试，然后正式开学。当时共招收了一百五十多人（其中有一部分地下党员）。这部分同志第一阶段只经过了十天左右的学习，就分到各区、乡征粮，并参加了剿匪工作。在工作和斗争中绝大部分同志表现英勇坚定，有的同志在剿匪中英勇牺牲，如杨应集、杨守职（地下党员）、张青富（女）、陈韵琴（女）等。在剿匪后期又集中学习了一段时间，即分配到县里各科室和各区乡工作，这批同志和南下来的及地下党的老同志们一起，历尽艰辛，成长也很快，有的后来还担任了地、县级领导干部。四十年后的今天，还有几位青训班的同志战斗在第一、二线。

五是在接管旧政权时，选择了一批虽从事过旧政权工作，但思想较进步，政历又比较清楚的人，作为留用干部。在当时我们老干部不多，青年干部又缺乏实践经验的情况下，这部分同志对我们顺利接管旧政权，建立新政权及在征粮、剿匪工作中起到了积极作用。如斑竹乡的张仕才等同志，他们在征粮剿匪及后来的工作中，立场坚定，表现都比较好。

六是解放初期通过组织宣传队、征粮队、助征工作队、减租退押工作队及地下党推荐等形式，吸收了一大批社会知识青年。他们经过征粮、剿匪、减租、退押、清匪、反霸斗争的考验，有些人还参加了各种短期训练班的培训，逐步地成长起来，不断地充实了县、区各级领导和工作班子。仅一九五〇年就选拔吸收知识分子干部二百一十八人，农民干部九人。后来又逐步提拔了一批。上述同志在工作中有的还逐步成长为县、区级领导骨干。

七是从农村中挑选积极分子组成减租退押工作队、土改

工作队。一九五〇年县里举办了农民积极分子训练班三期，共培训了二千四百四十七人。同年十一月上旬我县开展了减租退押、清匪反霸的斗争。全县又组织了三千二百九十九人的工作队，其中很大一批是农村积极分子，当时称为半脱产。这部分同志通过斗争的实践，大都成了乡、村基层政权的骨干，有的还提拔为区级干部，如一区的张生林、二区的黄德云、三区的李学光、四区的赵克明、七区的文明光、八区的曾子清等。

解放初期的选拔干部，主要是通过阶级斗争实践的考验，从阶级观点、立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大公无私的品德，艰苦朴素，深入联系群众的工作作风和一定的工作能力诸方面来考察选拔，再结合短期培训不断提高思想政策水平和工作能力。这种就地选拔，教育培养，实践检验的办法，了解放初期干部不足的问题。

第二、深入发动群众，从政治上、经济上打垮封建势力。

铜梁县解放后的打垮封建势力的斗争，是从征粮剿匪工作开始的。

解放初期，当我们展开征粮工作时，国民党潜伏的特务与地方上的恶霸地主、坚持反动立场的旧乡保人员互相勾结，搜罗国民党的溃散官兵，集聚民间枪支，裹胁部分群众，组织土匪暴乱，破坏征粮，妄图复辟。全县一月下旬先从靠近大足的边区开始，在不到一周时间就遍及全县。当时猖獗的股匪：一是以大足段西铭为首的“反共救国军川东北游击总司令部”，勾结平滩的匪首高蜀龙、万春儒、大庙的金杰三等，活动在乎滩、双河、虎峰、大庙及铜大边界一

带；二是以岚峰的伪乡民代表主席王金谷和璧山的黄荣卿等为首的“铜梁反共保民军联合指挥部”活动在旧县、蒲吕和城郊一带；三是以虎峰的李载云、福果的任恢先为首的“铜璧反共保民军总司令部”，活动在西山及铜璧边界；四是以白羊的陈永质、关滩的周隆吉、合川的李龙光为首的“反共九路军司令部”，活动在安居、平滩、合川、潼南边界一带。另外还有很多中、小股土匪，他们和上述股匪既有联合又各自独立活动，全县土匪猖獗时多达一万余人。

当土匪在各区袭击征粮队、围攻我区、乡政府，捕杀我革命干部，到处抢粮抢物，进行反动宣传，破坏我征粮工作，妄图颠覆我新生人民政权时。县委、县府根据地委的指示，果断决定暂停征粮，转入集中全力剿匪，并和上级派来剿匪部队共同组成“剿匪委员会”（当时是三十五师的一〇五团为主负责铜梁剿匪）采取把地方干部武装起来，部队和地方干部互相配合，对大股土匪集中围剿，对小股土匪分别歼灭的办法，经过近四个月的时间，大小数十次战斗，特别是二月二十三至二十七日的“围剿干洞子，歼灭王金谷”的战斗，三月十一日“围歼如意寺陈永质匪部”的战斗，二月十三至十七日的“韩婆岭之战及围歼大庙场匪众”的战斗，四月二十九日至三十日的“围歼永清寺残匪”的战斗和五月初“虎峰大埡口歼灭李载云”的战斗，都给土匪以致命的打击。我曾亲身参加了“韩婆岭之战”和“围歼如意寺活捉匪首陈永质的战斗”，故记忆深刻。

全县剿匪过程中，共计歼灭土匪一万多人，其中打死打伤一千五百多人，俘虏一千六百多人，投诚自新的七千四百多人，被歼灭和捕获的大小匪首七百多人。匪乱平息又继续

开展了征粮工作。

剿匪和征粮结束后，于一九五〇年十一月至一九五一年的四月在全县展开了减租退押、清匪反霸运动，从政治上、经济上打垮封建势力。这一运动是由点到面逐步开展的。

在减租退押运动开始，首先抓了组织成立农民协会工作。一九五〇年十一月中旬，召开了农民代表会议，成立了县农民协会筹备委员会。接着各区于十一月下旬又分别召开了农协筹委会。在成立县农民协会筹委会之前各村就展开了建立基层农民协会工作。发动成立农民协会过程中，先做了深入细致的发动群众工作，在组织农民协会委员会的班子时，特别注意了在征粮剿匪中表现好的雇贫农成份，要占协会领导成员的70%左右，中农只占30%。在农村成立农民协会的基础上，又成立了乡农民协会。这期间农民协会发展很快，在减租退押初期，全县农协会员就发展到十万余人。

在成立农民协会的同时，各乡（镇）、村又抓了建立、整顿农民武装的工作，把枪杆子掌握在雇、贫、中农手中。全县在解放初期和征粮剿匪工作中，就组织有农民武装一万多人。整顿农民武装主要是清理不纯分子和地主阶级派进来的人。全县通过整顿，又新发展了武装队员六千多人，农民武装达到了一万六千多人。这支共产党领导的农民武装，在减租退押、清匪反霸以及后来的土地改革工作中，发挥了骨干作用。被压迫被剥削的广大雇、贫、中农，因为有了自己的组织和武装，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倍感扬眉吐气，斗志昂扬，表现了主人翁的姿态。而阶级敌人在农会和武装面前，则只能规规矩矩，不敢乱说乱动。

在这个时期，县、区、乡各级领导、工作队的干部与贫

苦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访贫问苦，扎根串联，谈心交友，启发觉悟，组织开展诉苦教育，帮助他们找解放前受剥削、受压迫的根源，提高他们的阶级觉悟和当家做主的思想，认识到要求得翻身解放，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下起来斗争，自己解放自己。

在发动和提高群众觉悟的基础上，先展开了清匪反霸工作，全县清查出自新未自新的匪分队长以上的骨干及勾结窝藏土匪的地主一千三百多人，清出自新的一般土匪七千多人。追缴出长短枪四百〇八支，土枪、土炮、刀矛等二千六百二十二件，电台二部，各种子弹二万六千一百三十四发，另外还有吗啡、鸦片等违禁品三万五千五百八十八两。

运动中对那些有民愤、有血债、又有现行破坏的恶霸、地主分子，组织发动群众开展说理斗争，对罪大恶极的土匪头子、特务、恶霸及破坏减退工作的地主分子，分别处以极刑和徒刑。

随着政治斗争的深入，展开了经济上的清算，减租、退押同时进行。减租的对象和标准是：按照国家减租条例规定“凡地主、富农及一切机关、学校、祠堂、庙宇、教会出租的土地均应实施减租，在原租额的基础上减至不得超过原租额的35%。”全县减租结果，佃户当年少交租谷二千三百一十七万二千八百五十公斤，有五万七千八百三十四户农民，平均每户受益三百八十三公斤。

退押的原则和规定是：“凡地主、富农收取佃户的押金，原则上应一律退还，保本保值，不计利息。时间从一九四〇年后算起，以历次加押的总和为准，中贫农所退得的押金一律归还本人。佃富农所退得的押金，以一部或大部调剂

出来，二地主所退得的押金全部调剂出来，分给从事劳动生产的雇、贫农”。全县应退押的地主是一万四千八百六十五户，实际退出黄谷、及物资折谷三千三百七十九万九千五百六十四公斤，受益农民计四万九千一百户，平均每户受益六百八十八公斤。减租、退押，清匪、反霸的结果，从政治上、经济上打垮了封建势力，同时使苦大仇深的雇、贫、中农政治上觉悟起来了，经济上又得到了实惠。经过运动的考验，一批基层骨干成长起来了，这就为建立新的基层民主政权，为下一步开展土改运动打下了基础，为发展生产，开展各方面的建设事业扫除了障碍。

第三、自下而上，有计划有步骤地建立村、乡级民主政权。

解放初期的接管旧政权工作，对乡、保两级，基本是维持原状。保长、乡长表现好的改称为人民保长、人民乡长。而实际则是村掌握在村农民协会手中，乡主要由派去的乡指导员(即乡支部书记)和乡农民协会负责。真正的基层民主建政工作，是从减租退押后期开始到土改结束才全面完成的。先是将保改为村、甲改为邻，再发动村民民主选举村、邻干部。选举前与农民协会协商成立筹备组织，经过发动群众反复讨论酝酿出村干部候选人。村干部的候选人一般是村长、副村长、武装委员、财粮委员、民政委员、文教委员、生产委员、青年委员、妇女委员等九人。

在酝酿好村干部候选人的基础上，实行差额，采取丢豆子的办法民主选举。就是按参选人数发给每人应选干部多少的豆子粒数以代选票，请候选人到会场逐一介绍后，齐齐的坐在一长排凳子上，每个候选人后面放上一只碗，由参选的